

在 王 蒙

陈建功

名誉主编/陈建功 主编/傅光明

文

刘震云

学

从维熙

馆

邱华栋

格 非

听

余秋雨

讲

余光中

座

龙应台

曹文轩

# 聆听大家 不朽的文字课

TING TING DAI JIA BUXIU

DÉ WEN XUE KE

DE WEN XUE KE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在 文 学 馆 听 讲 座

聆 听 大 家

# 不朽的文学课

名誉主编/陈建功 主编/傅光明

王蒙

陈建功

刘震云

从维熙

邱华栋

格非

余秋雨

余光中

龙应台

曹文轩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聆听大家·不朽的文学课 / 傅光明主编. —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9 . 1

ISBN 978 - 7 - 5396 - 3075 - 5

I . 聆… II . 傅… III . 文学 - 演讲 - 文集 IV . I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7404 号

**名誉主编:陈建功**

---

**聆听大家·不朽的文学课**

**主 编:傅光明**

---

责任编辑:吕冰心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230071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16.75

字 数:280,000

印 数:6,000

版 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 - 7 - 5396 - 3075 - 5

定 价:25.00 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序：聆听的愉悦

傅光明

作家俗称是要笔杆子的，谁写得好，常被誉为笔头儿厉害，有的甚至可以把笔用作刀枪剑戟，令心虚者胆寒；当然，也有的拿笔溜须拍马，成了御用帮闲。

再一个对作家习以为常的感觉，似乎是写得一手锦绣文章，却不一定口才卓然。实非尽然，别的不说，单看曾被许多现代文学史长期盖棺论定为座次排名前六位的鲁（鲁迅）郭（郭沫若）茅（茅盾）巴（巴金）老（老舍）曹（曹禺），文采自不必评说，口才几乎都堪称演讲家。与之相比，倒是文坛的后学晚辈逊色者多，不少作家文采斐然，口才就差强人意了。尤其是或性情木讷或善于私人写作的，只把自己关在艺术探险的象牙塔里，远离公共视野，执著于笔头儿，不善社交、辞令。这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。因为纯粹对一个作家来说，他的艺术生命力完全取决于他的笔头儿，而非口舌之快。

作家笔能写，口亦能纵横辞章，挥洒真知灼见，最欣喜莫过于“粉丝”读者们能见到他/她的真人秀。因为不仅阅读文学是一种精神的愉悦，聆听文学，也是一种精神的愉悦。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兴起以后，众多的网友还可通过视频聆听自己喜爱的作家，并与之交流。

阅读与聆听，尤其现场聆听的滋味与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事实上，比起广播、电视、网络视频，杏坛开讲的现场聆听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，这也属于老字号。

我常感到可喜的是，这种最古老的开坛与聆听方式，到今天还依然有着

鲜活的生命力，全国许多地方都举办起了各有特色的公益性讲座，且几乎都为各地的人文景观增添了亮色，形成当地的文化品牌。我更感到幸运的是，作为文学馆公益讲座的主持人，我已经在讲台上度过了近八年岁月。现在，聆听文学馆讲座，不仅已经成为许多忠实听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与事业。我爱它，唯恐它受到哪怕一点点的伤害。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二十位知名作家在文学馆演讲的结集，年龄上可谓老中青三代会聚，内容上则各展其当行本色，谈创作的经验、想象力和真实，聊人生的“一地鸡毛”，从秦可卿解《红楼梦》，由潘金莲评《水浒传》。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是什么？面对喧哗的时代，作家该有怎样的定力？要有怎样的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？全球化了的“我”在哪里？各成一家言。

透过阅读，可以感受文调就是那个人；透过聆听，可以感觉那个人的文风亲和地吹拂着走近你，那个人就是他们——按时间先后莅临文学馆演讲的作家：王蒙、陈建功、刘震云、从维熙、邱华栋、格非、余秋雨、余光中、龙应台、曹文轩、张抗抗、叶广芩、陈丹燕、赵大年、刘心武、魏明伦、陆天明、范稳、陈忠实、邓友梅。

2008年10月20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# 目录

聆听大家·不朽的文学课

序	聆听的愉悦 ◎傅光明
0 0 1	挑战与和解 ◎王蒙
0 2 2	喧哗的时代与作家的定力 ◎陈建功
0 5 4	从《一地鸡毛》到《一腔废话》 ◎刘震云
0 7 8	文学与人生 ◎从维熙
1 0 0	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内在动力 ◎邱华栋
1 2 8	经验、想象力和真实 ◎格非
1 6 4	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 ◎余秋雨
1 9 3	创作与翻译 ◎余光中
2 1 6	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? ◎龙应台
2 3 2	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 ◎曹文轩

## 挑战与和解 ——文学与我们

王 蒙

傅光明：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欢迎来到文学馆。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。对他就不用介绍了，大家一定比我还熟。他今天带给我们的演讲题目是《挑战与和解——文学与我们》。我们已越来越不愿思考，小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艺术的小说和生活的我们面临怎样的挑战？让我们来听王蒙先生的演讲。

王蒙：各位好！有机会在这崭新的现代文学馆和各位交谈关于文学方面的问题，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。我今天实际是以一种漫谈的形式，想和各位共同探讨文学，特别是其中的小说，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，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果实，也作为一种思维和表达的方式，它有一些什么特点。

与自然科学、技术、人文科学、法律等各种人类文化的结晶相比，文学是显得挺不同。比如说，它的生命力比较长久，特别是自然科学非常明显，人文科学大致上也是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进化的轨迹，从比较原始的，很多带着假想，带着迷信，甚至于说巫术和邪教的影响，那样的对世界的一些看法，到能够走向开始构建一种科学的和实证的这样一个世界观。这都不是我所擅长的，不见得是我能说得清楚的，但是我想至少是这样子的。到

牛顿的力学，然后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拿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医学来说，从放血、刮痧、拔罐子，这些也都很好了，接着有草药，有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、制剂，然后有抗生素等，它有一个进步的轨迹。有了新的技术以后，往往能代替一些旧的技术；有了新的理论以后，往往就可以代替原有的理论。可是，文学就很难代替，而且你也很难说进步不进步，文学思潮可以不断地进步，作家的思想可以不断地进步。但是，一部文学史你很难说成是一部进步的文学史。

《诗经》是落后的？现在出一本二〇〇一年诗集，就是最进步的？那天知道！小说也是越来越进步的？新新人类的小说是最进步的？汉魏六朝的那些笔记小说是落后的？或者“唐宋传奇”是落后的？还是《红楼梦》是落后的？你很难说。

比如说，我们现在还可以阅读几十年前、几百年前，甚至于千百年前的小说著作。读起来当然是具体的风俗习惯有很多变化，但是它最基本的情节，它的人物的那些悲欢离合，仍然能够引起我们的一种关切，仍然能够使我们怦然心动，仍然能够感觉到他还活在我们当中。在《红楼梦》里面，林黛玉她永远就是那么十四五岁，她永远不会老。你想象不出说林黛玉老了，现在有二百多岁了。你不会这样想，林黛玉永远是这样。贾宝玉永远也就是十五六岁的那么一个小公子，挺漂亮的，多情，也很聪明。我们几乎也想不出来，清朝还有哪套书能够跟《红楼梦》相比，仍然被这么多人所热情地在那儿阅读着，尽管那个时候，会有很多策论，会有很多书，有些书也很有价值。拿中国来说，能够和长久流传的文学作品相比的，唯有古代的哲学家的一些著作，也就是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这个可以，现在还有人看。但是我有一个怪论——我不知道，咱们大家一块琢磨琢磨，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哲学家他们的作品至今还有魅力呢？因为，他们是非常文学地写出来的，他不是用那种逻辑的、实证的语言，你可以把它当文学书来阅读的呀！不是寓言，就是故事，在文字上讲究、音韵上讲究，有的甚至于像谜语，你可以猜来猜去，可以这么解释，也可以那么解释，你可以把它当文学的书来阅读。就是说，文学性给了中国先哲们的著作以更长久的生命力。

外国也是这样，比如说《圣经》和《古兰经》都很好读，佛经应该也是很好读，但是它们都有很高的文学性。即使你不是一个神学家，不是一个特别的、虔诚的宗教信徒，你仍然可以把它当文学书来加以阅读。

有时不同的人都可以喜爱，或者使用，或者援引一部文学作品，它可以

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对一个作品进行探讨，而且都言之凿凿，都非常有根据。有的肯定文学的作用，可是角度各不相同。对小说的作用最夸张的就是梁启超。梁启超说：“欲兴一国之政治，先兴一国之小说；欲兴一国之社会，先兴一国之小说；欲兴一国之经济，先兴一国之小说；欲兴一国之风俗，先兴一国之小说。”总而言之，你要改革中国，你想期待一个新中国的出现，你就必须有新的小说。他这也有理呀。就是说，小说表达了人们的理想，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期待。这个也不能够完全说是梁启超的发明，因为自古以来就有呀，有很多那种所谓乌托邦主义的作品，你是写《理想国》也好，你是写《新大西岛》也好，那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。

还有的从一种积极的政治的角度讲，这个小说非常好。比如说，高尔基写了《母亲》，他是直接描写沙皇俄国时期的工人的斗争，据说普列汉诺夫就认为高尔基的《母亲》写得不算很成功，艺术性不是很强。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只是普列汉诺夫，包括我所接触过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、主管，也有这个观点。

这种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谈文学的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就给我讲过，我当时听了真是佩服极了。他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怎么起来的？就是由于小说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，就是林琴南把它翻译成《黑奴吁天录》的。说法国大革命是怎么胜利的？就是由于《马塞曲》。当时都已经打不过去了，革命者就要失败了、完蛋了，这时候一唱起《马塞曲》来就热血沸腾，一下子把反革命摧枯拉朽，胜利了。我也不知道他讲得对不对，但是我从小就觉得这个文学了不得了，简直就是神功了，对人精神上的作用太大了。

还可以从更具体的角度来肯定文学。

河北省开三级干部会就印发了陆文夫的小说《围墙》，认为陆文夫的小说里写了两种干部，一种干部是光说不练，一种干部是埋头苦干。“实干兴邦，清谈误国”，中国就是需要实干的干部，所以把这个发给大家了。

据说刘伯承很喜欢读小说《日日夜夜》，因为《日日夜夜》里面有些对巷战的描写，对斯大林格勒，现在的伏尔加格勒战役的描写。我还记得它里面有一段对巷战的描写，红军从一个窗户里头冲到一个楼房里头——一个盘踞着法西斯德军的楼房里头，他人还没站稳呢，先拿机枪“哗哗哗”先扫。他来不及看，因为要等你看清楚了，人家早把你毙掉了。据说刘伯承很欣赏这一点，他从战术的角度，觉得《日日夜夜》写得很好。

斯大林肯定考涅楚克写的《前线》，因为《前线》里面描写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将军，不懂得接受新的事物，就是老粗，苏联老红军。另外还写了一个专门假报成绩的记者客里空，非常有现实意义。此外好像还有人到现在还研究《红楼梦》里头那道菜，叫“茄鲞”。说那个“茄鲞”到底是怎么做的？就是王熙凤给刘姥姥吹的“茄鲞”怎么做怎么做……后来，刘姥姥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做这么一个茄子，还得需要一百只鸡。”但是也有人跟我说，有人用这种方法去做菜，最后做出来很难吃。还有人很认真，把《三国演义》里头的“木牛流马”，因为书上面有尺寸，就按那个尺寸，做出来的，马也不是牛也不是，根本不可能起到书上写的那些作用。现在的人分析说，“木牛流马”就是一种独轮手推车，能够在山区行驶，但按那个尺寸做出来，连独轮手推车的作用也起不到。

与此同时，这文学又老有点像个异端，在社会上，老处在一个可疑兮兮的这么一个地位。这在中国更有传统，比如说林黛玉一次说话引用了《牡丹亭》里面的一句话。《牡丹亭》不是小说，是戏剧。后来薛宝钗对她进行个别帮助，“颦儿，过来，刚才你说什么了？你的话儿是哪儿来的？”林黛玉脸就红了。薛宝钗又说：“我们女孩怎么能读这些呢？我小时候，也爱读这个，当时家里面打的打，骂的骂，烧的烧，不能读这些东西，读了这些东西会移了性情，移了性情，就麻烦了，不要读这些！”薛宝钗的这种观点在我们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和广泛流传的基础。

七十年代，你们在座的年轻人不懂这些名词，岁数大一点的当然知道，“一打三反”的时候，我还在新疆的农村里，来了一个宣传队，在农民里面抓反革命。当时我懂维吾尔语，被革命的宣传队所使用。那个组长说，我对你们还是可以利用的，我说“好好，欢迎利用”。所以我给他们当翻译。村里有一个小伙子，他有很多小说，都是前苏联塔什干出品的，有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，还有《纳瓦依》，这都是在中亚最有名的东西，宣传队就把他的这些书全收缴了。收缴以后，我们大队的书记，就找这个小伙子谈了个话，亲切而又严肃地说道：“兄弟，不要看这些书了，这些书看完以后，思想出了问题，你就麻烦了。你当了现行反革命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”

我们中国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就是认为文学风花雪月，雕虫小技，好像有点“小说这东西狗肉包子，上不了台面”的意思。中国古代对诗和散文还比较重视，小说是引车卖浆之流了，甚至有“诲淫诲盗”的内容，总是对它有一种戒心。文学令人产生戒心。所以，有这样一些现象，就值得我们来分

析一下，文学特别是小说，受到读者那么多的喜爱，那么为什么又有众说纷纭的一些说法，乃至还引起了一种戒心。

那么，我们就谈一下文学特别是小说所具有的挑战性。这个挑战性不是指政治、社会的方面，而主要是从思维方式上来考虑，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挑战性。

头一条就是独创性。独创就是挑战，世界上什么事，你想有个发明创造，就是挑战，对已有的模式，对已有成果的一种挑战。当然是挑战，大家原来谁发烧都喝柠檬茶，后来又发明了消炎片、璜胺制剂了，到时给吃消炎片吧，这当然是挑战。原来最快的车是马车，真漂亮，我在波兰参观过一个马车博物馆，那真是太漂亮了，现在的大林肯、雪佛莱、别克那简直算什么呀？你要看到中世纪那些贵族坐的那个马车呀！你就……有了汽车，有了火车，这都是挑战。中国有很可笑的故事，清朝开始修火车的时候，周围的老百姓吓的呀，还有反对的，还有不准开的。说是这个第一列火车开了一会儿就不让开了，然后火车怎么办，再让牛去拉。反正有很多这一类的很可笑的故事。这种故事在英国也有，英国在发明出第一列火车来的时候，也有这种情形，那像怪物一样。其实干什么都需要独创，但是那种独创性还不像写小说这么明显。你比如说，洗脸的香皂，我们也希望它有独创性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认为“四合一”是最好的香皂。后来，我收入也高了点，我指的是一九五七年以前，也出入一些大场面，比如说到中南海去听前苏联演员唱歌，我就发现有比“四合一”更好的香皂，就是檀香皂。前几年没完没了做广告的是“力士”，现在最好的香皂是什么？你们在座的朋友有没有能告诉我的？但是这香皂它不管怎么变化，你选择了这一样香皂，基本上可以代替那一样香皂。比如说，你家里，你喜欢“力士”，你就买“力士”。“力士”你用的很好，你就用“力士”。你不需要一边用“力士”洗这个手指头，用“檀香皂”洗那个手指头，或者是“舒肤佳”洗那个手指头……没有这样的人，如果有这样的人，可以到安贞医院去吃点药。

可小说不好办，你可以说我喜欢张爱玲的小说，那您就喜欢张爱玲的小说。说我既然喜欢张爱玲的小说，就不需要看王蒙的小说了，那你吃了大亏了。互相不能代替，谁也不能代替，你写得再好，你代替不了我，对不起。作家都在那儿想尽了办法，所以语不惊人死不休，所谓特立独行。这是种独创性，而且是一种个人的独创性。一个产品出现了品牌，出现了一个新的牌子，这也是一种独创。但是这种独创，它不一定是个别的，它是这公司的，你

弄不清是多少人在这里边劳动。比如诺基亚 8810 有一阵吹得挺邪乎，这也是不断的创造，但是它这里头是集体创造的。但是文学，特别是小说，它又非常强调个人，这种个人的独创性有时候会引起人的不安，甚至于会引起社会的不安，这种独创里面就包含了某种超前，既可能是超前的，又可能是个骗局。不要认为打着独创旗号的都是好东西，它可能是骗局，这样的争论全世界至今没有停止。

比如说，现代派的艺术作品，是独创，还是骗局？到现在有说是骗局的，说这完全是骗局，后现代就更是骗局。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独创，这种独创的挑战性可以挑战到什么程度呢？据说当年法国上演左拉的戏剧的时候，剧场门口有盛大的游行示威，抗议这种不成体统的作品搬上舞台。就是说，一种文学样式或者一种文学上的探索能够使社会不安到那种程度，这还得，它和这个社会可以抗拒到那种程度。

去年九月，我到爱尔兰参观。爱尔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，但是它的文学太棒了，爱尔兰人又会说话又会做文章，萧伯纳是爱尔兰的，王尔德是爱尔兰的，叶芝是爱尔兰的，都是爱尔兰人。其中，我就看到了詹姆斯·乔依斯写的《尤利西斯》，他有一段有意思的话，这段话印在一件文化衫上。我非常懊悔，我没有买这个文化衫，当时不是因为钱的关系，我是怕太欣赏那段话，怕引起别人对我的攻击。

他是英语讲的，他说我对待这个社会有三个办法，第一个办法，就是逃脱 Escape，第二个办法就是沉默 Silent，第三个办法就是搞点阴谋诡计 Cun-ny。这个词的意思要翻成汉语，倾向性太明显，你要翻译成阴谋诡计这当然是坏的，但它又可以翻译成巧妙、机巧、巧妙应对，这又变成好的了。但是在英语里，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。我琢磨这乔依斯他生活在爱尔兰，他从哪儿弄这么大的学问？这有点像华人的学问，到了这一步了。因为这个乔依斯在他的作品《尤利西斯》发表的时候，他没有得到任何好评，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、瞎闹的东西。至今西方国家也仍然有一派认为乔依斯的《尤利西斯》是一个骗局，认为毕加索是骗局的也有。认为这个是一个骗局，没有任何了不起，这本书就是故弄玄虚，就是折腾你。我无权对这本书本身说话，因为你真要对这个书说话，不但要看这本书，而且要从原文看。你要不从这个原文看，你光从翻译上看，不管翻译得多么好，反正是够戗。这种屡见不鲜的对于某个著名艺术作品是“骗局”的指责，正是对于独创的挑战的一种反面的回应。

那么第二点，特别是小说的创作，我这里边尤其是指长篇的小说的创作，它具有一种整体性，就是说它给你的不是一个结论，给你的不是一个命题，给你的更不是一个口号、一个呼吁：“同志们冲啊！”那不是，它是整体的，它是把这么一群人，把一个社会，把一个时代，把一个群体，它的多种多样，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种种现象，它都给了你。好的和坏的，美的和丑的，可以理解的和匪夷所思的，它全都给了你。

这种整体性，有时候让你抓不着它，有时候让你老是琢磨不透。比如说肖洛霍夫，前苏联的肖洛霍夫可不是不同政见者，他后来是苏共中央委员，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的时候，苏联的政府代表团的成员里面有肖洛霍夫，肖洛霍夫在前苏联的作家代表大会上，曾经慷慨豪迈地说，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们苏联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，他们是一群蠢人。他们哪儿了解苏联作家的心情，我们写作是按照我们的心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属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！讲得真棒呀！又是按心写的，可是心又属于伟大的党。我要是赫鲁晓夫，我听了我也乐死了，上美国，上哪儿都得带着他。

但是最近，我看到有一个前苏联文学专家叫蓝英年，他是蓝公武先生的儿子，蓝英年的一篇文章就分析肖洛霍夫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。他说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不能说成是对农业集体化的颂歌，相反地，你仔细看这个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，越看越像是暴露农业集体化的黑暗，是一塌糊涂，宰杀牲畜呀，恐怖呀，以至于农民要到武装暴动的程度，一些干部是胡来呀！里边有一个老粗整天鼓吹世界革命的，他老是执行极左路线，但是他又被一个富农女人给迷住了。这拉古尔洛夫别的事我已经全忘了，我只记住他的一句名言“女人是人民的鸦片烟”。这个是肖洛霍夫写的，我的文章里可绝对没有这种对女性不敬的，连这么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。这个蓝英年置此说以来，我再看这个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，我真看出来，肖洛霍夫这个老狐狸一边向赫鲁晓夫表示效忠，效忠得那么好，一边黑暗还真揭露，揭露得还真叫你头皮发麻。因为这长篇小说里面是一个整体的东西，有互相矛盾的东西在里面。如果你们是一个小说家，你们在描绘我在这儿讲演的时候，你们就一定不会忽略茶缸子盖掉在地上的这个细节。如果你是一个整理文集的人，你就完全不必要在文章里写上讲话的此处画一个括号“此时茶缸子盖掉在地上了”。你就扰乱了读者，你不需要这个整体性。很多学问都不需要这个整体性。你要这个整体性干什么？

力学定律讲的就是力学定律，医学临床治疗的丛书讲的就是临床治疗。

阑尾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什么地方,你那时候旁边有茶缸子没茶缸子,天上打雷还是下雨,或是你跟你爱人是要睡觉是要离婚还是马上就要做爱,这跟你马上要做阑尾的手术毫无关系。那些东西都不需要,都可以过滤掉。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在什么地方,你这一刀应该怎么下去,事先当然还要消毒,还要麻醉这一套。

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,尤其是对于写长篇小说的人来说,他有一种最可贵的感觉,就是你生活里面的一切的体验都是有用的,没有没用的。你今天挺倒霉,所谓是你今天喝凉水都塞牙,你过了这么一天,很可能你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小说的细节。说不定比你这一天处处顺利,春风得意那个小说写出来还好,或者是一个短篇小说,或者是一个章节。但是这种整体性,它和其他的学问不一样。作家有时候让人挺烦的就在这儿,因为其他的学问要求的都是明快,比如说法律,什么是禁止的,什么是不禁止的非常清楚。那么禁止的东西,就是所谓违法的东西你做了,是判一年,是判两年,还是枪决?这要求得非常清晰。炒菜,烹调要求非常清晰,虽然一般中国人的脑子都没有那种清晰的感觉。我是看完了炒菜的书,就绝对不会炒菜了,白糖 15 克,红糖 1.5 克,酱油 25 毫克,你要看完了这个以后你绝对不会炒菜了。但是人家的表述是绝对清晰的,是我们的脑子不清晰,所以你受不了。开汽车,这更清晰,你靠右行走,你绝不能说或靠左行走,那可不行,你从左面超车,那就是从左面超车,那绝不能说是从右面超车,要是两条线、三条线那就另说。

可是文学它这么一整体,就出现了一种不确定性,好像立场不太鲜明,你到底是要干吗呀?你到底是说它好,还是说它不好呀?不是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,有的文学作品是非常清晰的,比如说抗日,那是非常清晰的,就是说要抗日。比如说抗美援朝就是抗美援朝,它是非常清晰的。但是确实是有很多作品,特别是长篇小说,由于它的整体性,它就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,或者多义性,而这种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呢,对社会的已经为大家公认了的原则,就形成了一种变相的有意的或者无意的挑战。我们解放以后进行过一些非常烦琐的讨论,这些讨论现在看都是不可思议的,但当时为这些讨论,不但是掉了细胞,恐怕还有人要掉脑袋的呀。比如说我们讨论写英雄,还能不能写缺点,然后写英雄还能不能写英雄死?写敌人,敌人能不能有优点,敌人长得什么样?到了文化大革命中,那敌人出来以后那脸的颜色都是,你弄不清那脸上是抹了黄酱了,还是……鼻子、眼睛反正没有一样可

以长的是地方的。如果一个敌人出来长得挺漂亮的，你这是立场问题。可坏人里头长得漂亮的可有的是呀，汪精卫长得就很好呀！你们在座的有没有研究，我从小可就知道，大汉奸汪精卫，堂堂的一表人才。所以这种整体性，有时候看完以后甚至让你感到一种惶惑。

小的时候我是非常革命的，非常追求革命，我十几岁就在党的教育下，十四岁就入党了。所以我教育我的孙子，我在孙子十四岁的时候说：“你呀，光知道玩，什么电脑游戏呀，什么日本卡通人，脑袋里全是这个。我在你这个时候，我当时都已经读过《社会发展史纲》，读过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我都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了。”结果我这孙子跟我说什么，“那你不入党你干什么去？那时候你也没有玩具可玩。”当然他要贬低我的革命经历了，可是他也有一点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当一个社会造成了普遍精神的匮乏，当一个社会不能够给儿童提供他们应该拥有的精神生活，包括玩玩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社会要垮台。也可能我是偏爱我自己的孙子的关系，听了以后我不完全否定他的说法，虽然将来还需要对他长期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。

我积极追求革命的时候，我革命革到什么程度吧，我看鲁迅的书，都覺得不过瘾了，因为他不直接描写一些共产党呀，你必须得给我描写出来。我只有看到什么时候感觉到带劲呢？就是革命烈士高唱着“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起来，全世界的罪人”，那时候不叫“受苦的人”，翻译成“罪人”，然后一排枪过去了，然后喊了一声“共产主义万岁”！我看到那儿，这才叫小说，这才是我所要求的小说！于是我看到哪儿呢，我就追求到前苏联的一个很有名的小说，在座的你们都不会熟悉的，就是《士敏土》，哥拉特考夫写的《士敏土》。它写的苏联战后恢复经济时期，《士敏土》就是洋灰。可是我看完那个，我傻了，怎么这个革命，革完了命那么混乱呢？简直是乱成一团了。里面有一个是描写苏联的清党，当场宣布，开除一个十足的阶级异己分子党籍，那个人立刻就拔出枪来，照着自己的胸口，“啪”就是一枪，然后主持开会的人眉毛一动都不动，继续开会。这么坚强！第一我很佩服，这个共产党真是棒，真是厉害，真坚强！第二我也害怕，我也胆战呀！革命都革成这样了，怎么办呀？然后里边那个区委书记想睡哪个女人，就睡哪个女人。这不跟强奸一样？按住就干，这怎么行呀？写一个富农，这个富农被驱逐到北海地区，苏联最高寒地区。里边有很多这一类的描写，我真是心惊肉跳。

所以说这种作品，你看完以后往往不是单一的，而是互相矛盾的，是充满了热情的，是有自己的倾向的，这没错。但是这个哥拉特考夫也是在苏联

文学史上包括被苏共当局所肯定的,认为他是反映了那种英雄主义的重建苏联的那种热情。但是同时,他又带给你无尽的惶恐,他那个场面描写完以后,我一想起来就有点紧张。清党的时候当场自杀,和脸皮连眉毛一动都不动,这个场面,我一直到今天,已经有了五十多年了,还记忆犹新。这是说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整体性。

那么很多小说,很多文学作品,它还有一种批判性,我不是指那种政治社会的批判性。小说和新闻的不同,就在于它可以写实际上没有的东西,它可以写你的理想,写你的幻想。因此它就构成了一个反差,就是小说里的东西和现实里的东西形成一种反差,这种反差本身带有批判性。我们拿一个和政治无关的题目来说,比如说爱情,最美的爱情几乎都在小说里面。如果你小说看得太多了,我想当然这很好。如果你不看小说,那么你很惨,将来搞恋爱的时候连情书你都不会写。而如果写不好情书,你在初次的爱情上会丢很多的分,你会失败的。可是你看得太多了,也麻烦。你要是按小说的标准来择偶来建立自己的婚姻的话,你的婚姻很可能是不幸的,因为小说是浪漫化的。好几个朋友跟我说,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自杀了,所以他们的爱情就是最伟大的,而且是由于误解自杀的。我不解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。说他们没有误解,到最后都知道了,都别自杀了,两人结婚了,没有计划生育,一下子生了八个孩子。罗密欧老了,朱丽叶也老了,脸上都有褶子了。罗密欧有点肠胃病,到晚上的时候朱丽叶给罗密欧打盆洗脚水,“洗脚丫子吧……你脚太脏啦。”完了,这故事情节全完了,不那么伟大了。

为什么爱情的故事那么多,爱情的小说那么多呢?就因为现实中十全十美的、浪漫的、青春永驻的、永远如诗如歌如画的爱情太少了。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有特别现实的一面,爱情再伟大,你得吃饭,老饿着肚子,那是件很麻烦的事,吃饭就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。你要结婚了的话,不但要吃饭,还得睡觉呀,睡觉就有几个条件。所以这种理想性与浪漫性往往就造成了对现实生活的批评、批判以至于否定。所以我们有些爱好文学的青年,特别是在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,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很不好的。为什么爱好文学?在一个单位里你要爱好文学,人们就认为他就具有以下的个人特点:第一,自认清高;第二,不安心本职工作;第三,跟自己的老公或者老婆关系不好,而且还有花花哨哨的各种传闻;第四,看不起领导,对本单位的组长、科长、处长都不老老实实汇报。这些青年如果有上述四个特点,提职、分房子一点份都没有,要是搞运动盖帽子倒都有份。

文学往往对既成规范形成一种有意无意的挑战。就说道德，道德是不可忽视的，但是他写小说的时候，不是那么严格地遵守道德的戒律，有时候他对某些道德的戒律还产生困惑。

据我所知，很多国家、很多社会都希望家庭相对稳定，希望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能够保持相对稳定。这对社会有好处，对国家有好处，所以都是谴责、批评，至少是不提倡外遇与第三者插足的。你们不要以为美国是一个多么随便的国家，不是那样的。那是好莱坞某些电影上要你玩的，你以为互相有好感后他很方便就拉一个人，搂着一块进旅馆？没那事儿，这种机会一百年也不见得有一次。我也反对外遇。美国有很多电影恰恰批评了因为外遇而导致了家庭破裂，尝到了恶果，可是我们的小说里就没完没了地写这个三角啊四角啊。你写一个小说，这个男主人公，是道德的模范，女主人公是模范的道德，两人从十四岁青梅竹马，十六岁开始恋爱，十八岁开始互相交换信件，然后男二十八，女二十五，符合国家提倡晚婚的标准结婚。三年以后只生一个孩子，然后从此你忠实我、我忠实你，见了别的异性肯定不侧眼珠，这倒也挺好，我也觉得挺好。但一个小说里，你就觉着爱情那个种子，到处在发芽，爱情的花朵到处在开放，一抬头，一斜目，听见了门铃声，都是爱情在向你召唤，可这不安全。第一，不道德。当然必须承认有很坏很坏的书，就像我说的骗局一样，这不但有骗局还有垃圾，而且有毒品。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第二，你又不要轻易地说它是一个毒品，因为这个东西，自古以来争执不休啊。

《金瓶梅》它是个什么东西？最近我看什么书还引用毛主席的话，就说这个《金瓶梅》在文学上还是有成就的。没有《金瓶梅》就不会有后来的《红楼梦》。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发表的，很多人都持这种观点的，就连《金瓶梅》也不能完全否定。那《红楼梦》原来也是禁书，什么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，什么《十日谈》，外国的东西更多，一个色情，一个暴力，这都是我们所反对的。但这又是许许多多文学作品里面不可缺少的元素。一个没有，绝对的没有，《红楼梦》里没有吗？曹禺的《日出》里没有吗？当然他是批判的，他不是欣赏的，他不是宣扬的。什么京八呀，翠喜呀，就是翠喜的那段话，开始演出的第一年的时候，我身边的一些共青团的工作者看了，也吓得脸都变色了，怎么这么演话剧呀？这么演话剧对青年人得有什么影响啊？

因为文学家是深刻的人文主义者，他只能围绕着人，人的思想、人的精神、人的情感，也包括人的欲望来写作。他必须承认人的欲望，食色性也，他